

【日本漢學研究專題】 Studies in Japanese Sinology

吉川幸次郎之《詩經》研究方法  
Yoshikawa Kōjirō's Research Methodology on  
*Shijing*

張寶三\*

關鍵詞：吉川幸次郎、詩經、京都中國學派

Keywords: Yoshikawa Kōjirō, *Shijing*, Kyoto School of Sinology

---

\*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 摘要

本文主要論述日本現代著名漢學家吉川幸次郎（1904-1980）有關《詩經》之研究方法。全文分為以下四節：一、吉川幸次郎生平概述。二、吉川幸次郎有關《詩經》之著作。三、吉川幸次郎之《詩經》研究方法。四、吉川幸次郎《詩經》研究方法之檢討。經由本文之分析，可知吉川幸次郎研究《詩經》，以廣搜參考資料、校勘文本、依循舊注、分析語言等為其重要方法。此種方法乃沿襲清代之考證學風，並嘗受其師狩野直喜之影響。吉川幸次郎之《詩經》研究方法，使其所論客觀有據，並能重視《詩經》語言中所具之美感。然其解《詩》多依循舊注而少創新，又鮮少利用清代以後中、日學者之研究成果，故所解未免流於過度保守之弊。

##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works by Japanese Sinologist, Yoshikawa Kōjirō (1904-1980), and his research methodology on *Shijing*. It is divided into four sections: (1) the biography of Yoshikawa; (2) Yoshikawa's research works on *Shijing*; (3) Yoshikawa's research methodology on *Shijing*; (4) the discussions on Yoshikawa's research methodology. By way of this investigation, we find that Yoshikawa's research methodology on *Shijing* is primarily based on his exhaustive research on reference materials, texts collation, adhering to old annotations, analyzing of linguistic elements, and other important methods. His methods of research is deemed as following the tradition of textual criticism of the Qing scholars, and is also heavily influenced by his teacher, Kino Naoki. Yoshikawa's research on *Shijing* is an objective study, which in particular, focuses strongly on the linguistic beauty of *Shijing*. However, his interpretations of *Shijing* sometimes lack innovative insights due to his close reading of old annotations. In addition, he seldom refers to studies made by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scholars after the Qing dynasty, which nevertheless is a bit too conservative in his ways of interpretations.

## 前言

吉川幸次郎（1904-1980）是二十世紀日本中國學研究者之巨擘，亦是近代京都中學國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sup>1</sup>吉川氏一生之著述極豐，其學術成就現今學者已頗多論評，<sup>2</sup>然專門針對吉川氏之《詩經》研究成果撰文加以析論者，似尚不多見。本文擬就吉川幸次郎有關《詩經》之著作加以觀察，探討其《詩經》研究方法之特色，並對其研究方法之優、缺點略作檢討，以期對吉川幸次郎之學術成就有進一步之認識，同時亦期能有助於瞭解現代日本《詩經》學之狀況。

### 一、吉川幸次郎生平概述

吉川幸次郎，明治三十七年（1904）生於日本神戶市花隈町。<sup>3</sup>父諱久七，母諱幾，幸次郎為久七次子，兄名益太郎。四十三年（1910）四月，入神戶市立中宮小學，四十五年（1912），轉諏訪山小學。大正五年（1916）四月，入兵庫縣立第一神戶中學。九年（1920）九月，入第三高等學校文科甲類。十二年（1923）三月，自第三高等學校畢業；四月，入學京都大學文學部文學科，受業於狩野直喜（1868-1947）、鈴木虎雄（1878-1963）諸先生。次年（1924），選擇以中國語學、中國文學為專業，同期生有斯波六郎等人。十

<sup>1</sup> 有關「京都中國學派」之起源及其稱呼，參見神田喜一郎〈《冊府》發刊之際〉一文（《敦煌學五十年》，收入《神田喜一郎全集》第九卷，東京：同朋社，1984年）。另參拙著《唐代經學及日本近代京都學派中國學研究論集》（臺北：里仁書局，1998年）。

<sup>2</sup> 如嚴紹澧撰有〈吉川幸次郎與「吉川中國學」〉（《學林漫談》第4集，1981年10月），興膳宏撰有〈吉川幸次郎其人及其學問〉（收入《異域之眼——中國文化散步》，東京：筑摩書房，1995年），張哲俊撰有《吉川幸次郎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另討論或描述吉川幸次郎其人者，更有多種，茲不具錄。

<sup>3</sup> 本文以所述吉川幸次郎之生平，參見興膳宏編〈善之吉川幸次郎先生年譜〉（收入桑原武夫、富士正晴、興膳宏等合編《吉川幸次郎》，東京：筑摩書房，1982年），拙作〈日本近代京都學派經學研究年表〉（收入《唐代經學及日本近代京都學派中國學研究論集》，同註1），張哲俊《吉川幸次郎研究》等。

五年(1926)三月,自文學部畢業,畢業論文為「倚聲通論」,以漢文書寫。同年四月,入學同校大學院,以唐詩為研究對象。昭和三年(1928)二月,狩野直喜自京都大學屆齡退休,四月赴北京擬參加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續修《四庫全書》之工作,<sup>4</sup>吉川幸次郎隨行,<sup>5</sup>以自費在北京留學,寄宿於東城演樂胡同之延英社,同宿者有倉石武四郎、水野清一、三上次郎等人。四年(1929)五月,因病自中國暫時返日。同年九月,受京都大學上野獎學金資助,再度赴北京留學。留學期間,主要在北京大學為旁聽生,曾受業於馬裕藻、錢玄同、沈兼士、陳垣、朱希祖諸先生。<sup>6</sup>昭和六年(1931)二月初,結束在北京之留學,前往江南遊歷,探訪南京、蘇州、揚州、上海、杭州等地,會見黃侃、張元濟、金松岑、潘祖蔭等中國學人。<sup>7</sup>四月,歸國,自京都大學大學院退學,任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所員,並兼任京都大學文學部講師。十年(1934),與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經學文學研究室」同仁開始進行《尚書正義》之會讀,爾後持續進行至十六年(1941)二月止。十四年(1939)春,與京都研究所同仁開始進行《元曲選》之會讀,至二十二年夏為止。十六年(1941)四月起,與同仁開始進行《毛詩正義》之會讀,至二十二年(1947)為止。二十二年(1947)四月,以「元雜劇研究」論文獲頒京都大學文學博士學位。六月,轉任京都大學文學部教授,擔任中國語學、中國文學第一講座。

昭和二十六年(1951),任日本學術會議會員。次年(1952),任國語審議會委員。三十一年(1956)國語審議會委員會任期屆滿;八月,任京都大學文學部部長。三十三年(1956)七月,卸任文學部長職務。三十四年(1959)四月,任日本中國學會理事長。三十八年(1963)一月,日本學術會議會員任期終了。同年四月,日本中國學會理事長任期屆滿。三十九年

<sup>4</sup> 此次狩野直喜於昭和三年(1928)四月赴北京,原擬參加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續修《四庫全書》工作,後因濟南事變發生,遂於當年五月末返日。詳參拙著〈狩野直喜與《續修四庫全書提要》之關係〉(收入《唐代經學及日本近代京都學派中國學研究論集》,同註1)。

<sup>5</sup> 此次與狩野直喜隨行者,除吉川幸次郎外,尚有小川茂樹(後易姓為貝塚茂樹),參見〈善之吉川幸次郎先生年譜〉。

<sup>6</sup> 參見張哲俊《吉川幸次郎研究》第一章第二節〈吉川與中國的老一輩學者〉。

<sup>7</sup> 見同註6。

(1964)一月，任日本藝術院會員。四十年(1965)一月，受邀在日本皇宮以「中國文學的性質」為題舉行宮中講書。四十一年(1966)五月，任東方學會理事長。四十二年(1967)三月，自京都大學文學部屆齡退休，此後乃居家專心研究。四月，獲頒京都大學名譽教授。此年開始，成立「讀杜會」，至昭和五十四年(1979)六月為止，共舉行118次。另亦與年輕學生一同舉行「小讀杜會」，至五十四年六月止。

四十三年(1968)三月，由門生策劃，筑摩書房刊行《吉川博士退休記念中國文學論集》。四月，吉川氏自編之《吉川幸次郎全集》由筑摩書房逐月出版一冊，至四十五年(1970)十一月，第二十卷刊畢。四十四年(1969)十一月，獲日本政府選為「文化功勞者」。四十五年(1970)三月，獲贈「NHK放送文化獎」。四十六年(1971)一月，獲贈「朝日新聞獎」。四十九年(1974)二月，由朝日新聞社出版《吉川幸次郎演講集》。四月，獲頒「勳二等旭日重光章」。五十年(1975)三月，任「學術文化訪中使節團」團長，率團赴中國大陸訪問二週。五月，由筑摩書房出版《增補吉川幸次郎全集》第二十一卷。九月，出版第二十二卷。同年八月，任東方學會會長。十月，獲贈國際交流基金獎。五十一年(1976)四月，《增補吉川幸次郎全集》第二十三卷出版。十二月，第二十四卷出版。同年十月，吉川幸次郎所編《東洋學的諸創始者》由講談社出版。五十四年(1979)三月，受中國社會科學院之邀，率領中國文學研究者訪華團訪問中國三週，四月歸國。八月末，因胃疾入京都大學醫學部附屬醫院治療。九月初，經胃部手術後返家療養。五十五年(1980)三月十五日，再度入院，四月八日上午四時四十五分，因癌性腹膜炎逝世，享壽七十七歲。五十九年(1984)三月，《吉川幸次郎全集(決定版)》全二十七卷，由筑摩書房開始刊行，至六十二年(1987)八月全部刊畢。平成八年(1996)《吉川幸次郎遺稿集》全三卷由筑摩書房刊畢。

## 二、吉川幸次郎有關《詩經》之著作

吉川幸次郎有關《詩經》之著作。除見於《全集》中通論性之著述外，亦撰有單篇論文、專著甚至未完稿。茲依其撰作年代之先後略述如下：

### (一)、《毛詩注疏》校勘記、日譯稿及〈讀毛詩注疏記〉

《毛詩注疏》之校定，乃吉川幸次郎任職於東方文化研究所時，與「經學文學研究室」同仁繼「《尚書注疏》校定」之後所進行之共同研究，惜未竟其功，僅留下部分未完稿。有關此事，吉川幸次郎在〈東方文化研究所經學文學研究室《毛詩正義》校定資料解說〉一文中嘗云：

在吾經學文學研究室，先前自昭和十年四月至十六年三月，前後六歷星霜，包括研究員、副研究員、助手、囑託員等全體室員前後計十餘人之共同協力，更有研究室以外或研究所以外篤志之士之助力，以此而從事校定唐國子祭酒孔穎達等奉太宗敕令撰進《五經正義》之一的《尚書正義》。於是有本所研究報告第十四冊《尚書正義定本》二十卷以饗學界。同時，作為其附帶成果，有〈讀《尚書注疏》記〉於《東方學報》連載，又有吉川研究員《尚書正義》全文之日譯，由岩波書店刊行。進而，自昭和十六年四月起，乃繼續從事《五經正義》中另一書《毛詩正義》之校定，依然為全室人員共同之研究。<sup>8</sup>

《毛詩注疏》之校定，自昭和十六年（1941）四月起，至二十二年（1947）吉川幸次郎轉任文學部教授止，前後共進行約六年。然所校僅至〈鄭風〉止，<sup>9</sup>未竟其業。關於此校定工作停頓之原因，平岡武夫在〈談論先學——吉川幸次郎博士〉中云：

<sup>8</sup> 見《吉川幸次郎全集》第十卷，頁446，東京：筑摩書房，1998年。本文原為日文，中文為筆者所譯，後引吉川氏之文皆同。

<sup>9</sup> 《吉川幸次郎全集》第十卷〈唐篇Ⅲ·自跋〉云：「（前略）採用〈《毛詩正義》校定資料解說〉中所述之資料，與同僚共同在東方文化研究所所為至〈鄭風〉為止之定本、校勘記及其翻譯之粗稿，今日被承接保存於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中。」（同註8，頁479-480，東京：筑摩書房，1998年）。

吉川先生之《尚書正義》費時十年始完成，<sup>10</sup>其次乃進行《毛詩正義》。由吉川、倉石先生及相同之成員為之，然吉川先生乃轉任文學部教授，命我繼其事。然而如《毛詩正義》如此龐大之內容，為之需費時幾年，實難預知。校完《尚書正義》，又校《毛詩正義》，我說我不能一生僅用力於《正義》，因而加以拒絕。倉石、吉川兩先生雖和我促膝談判，強制我同意，然我亦強硬拒絕。我說，本來若吉川、倉石先生來做，我可幫忙，或者先生百年之後，我可繼其事，然現在先生們康健，由我為之，實不適當。因此方向乃改變……。<sup>11</sup>

由上引平岡氏所述，可知吉川幸次郎調任文學部教授，當為《毛詩注疏》校定工作停頓之主因。《毛詩注疏》校定工作之成果，除《毛詩正義校勘記》外，另有〈讀《毛詩注疏》記〉及《毛詩正義》之日譯稿。唯此等著作因係未完稿，且未正式發表，故未收錄於《吉川幸次郎全集》中。<sup>12</sup>

## （二）、〈東方文化研究所經學研究室《毛詩正義》校定資料解說〉

此文原刊《東方學報（京都）》第十三冊第二分，於昭和十八年（1943）一月出版，原題作〈《毛詩正義》校定資料解說〉，作者署「經學文學研究室」，文末云：「吉川幸次郎記」。後收入《吉川幸次郎全集》第十卷，題目改為《東方文化研究所經學文學研究室《毛詩正義》校定資料解說》。本文初刊時既稱「吉川幸次郎記」，又收入《全集》中，當可斷定出自吉川幸次郎之手。

本文在未進入主題前，有一段引言，<sup>13</sup>引言中，首先介紹東方文化研究所經學文學研究室《毛詩正義》校定工作之緣起，再則闡述唐代《五經正義》之

<sup>10</sup> 實際工作時間乃六年，平岡氏此言「十年」，恐係記憶之誤。

<sup>11</sup> 見《東方學》第74輯，頁152-153，1987年7月出版。

<sup>12</sup> 有關《毛詩注疏》校定之情形，另參拙作〈日本近代京都學派對注疏之研究〉（收入《唐代經學及日本近代京都學派中國學研究論集》，同註1）。

<sup>13</sup> 原文未標「引言」之目，引言乃就其性質而稱。

價值以及歷來中、日學者對《正義》校勘不足之處，進而說明必須重新校定《毛詩正義》之理由。引言最後點出寫作本文之目的云：

現今當校定事業之始，對使用之材料加以解說，除考慮事業參加者及成果利用者之便外，亦聊存其他用意。如前所述，對吾等而言，最重要之資料乃我國所流傳之資料，其中所已知者，大體已全部蒐得。然未知之資料，或仍藏於故舊之家、潛於古剝之中。倘若能指出本解說之不備，進而得以添增新資料，則非獨本研究室之幸也。<sup>14</sup>

引言之後，即進入本文之正題。吉川幸次郎將此次校定《毛詩正義》所利用之資料分爲「甲、正義本」，「乙、經注本」，「丙、近儒校注本」等三類加以解說。各類又具體舉出各種版本。<sup>15</sup>由本文之解說，顯示吉川幸次郎對於中、日兩國所流傳之《毛詩》經注本、單疏本、注疏本等皆具有極深刻之瞭解。

### （三）、《詩經國風》

本書原列入東京岩波書店《中國詩人選集》第二種，於昭和三十三年（1958）三月出版上冊，同年十二月出版下冊。後收入《吉川幸次郎全集》第三卷。本書爲《詩經·國風》之日文翻譯及注解，翻譯包括日文訓讀與現代日語語譯兩種方式。每篇之首有解題，其作用如同《毛詩序》。各〈國風〉之前，對各〈風〉之地域、時代、國君世系、特色等皆有所解說，作用類似鄭玄之《詩譜·序》。此外，全書之首有〈解說〉一篇，內容包括：一、關於《詩經》，二、關於編者孔子，三、關於《詩經》之流傳與注釋，四、我的注釋方法等四部分。<sup>16</sup>書末有〈書後〉一篇並有「詩經年表」作爲附錄。本書之〈解說〉及〈書後〉可供探討吉川幸次郎對《詩經》之觀點。

<sup>14</sup> 同註8，頁449。

<sup>15</sup> 如「甲、正義本」中舉出單疏本、經注疏本、經注疏附釋音本等三小類。單疏本中又列有舊鈔單疏本、宋刊單疏本二種。經注疏本中又列有安倍本、宋刊八行本等二種。經注疏附釋音本又列有宋刊十行本、金刊本、閩本、監本、毛本、殿本、阮本等七種。

<sup>16</sup> 見《吉川幸次郎全集》第三卷，頁28-44。東京：筑摩書房，1997年。



#### （四）、〈松本雅明氏《關於詩經諸篇之成立》〉

本文發表於昭和三十二年（1958）十二月出版之《東洋史研究》，後收入《全集》第三卷。本文乃針對松本雅明所著《關於詩經諸篇之成立》一書所作之批評。由吉川幸次郎對松本氏之批評，亦可反映吉川本人對《詩經》研究所持之見解。

#### （五）、〈詩經與楚辭〉

本文原係吉川幸次郎對筑摩書房《世界文學大系》中《中國古典詩集 I》所作之解說，後收入《全集》第三卷。本文起始二節先論述「作為古典籍時代之先秦時代」及「作為前文學史時代之先秦時代」，對《詩經》、《楚辭》產生之時代加以探討，認為先秦時代乃是「前文學史時代」。以下吉川氏則分別對《詩經》與《楚辭》加以解說。

文中主要從文學之角度探討《詩經》。吉川幸次郎指出《詩經》中以抒情詩為主，且其抒情根植於日常之事物，此種傳統對後世有深遠之影響。此外，作為典籍之《詩經》，其中包含有「對政治之關心」、「富含戀愛詩」、「對人類自信的強烈感」等特徵。<sup>17</sup>本文篇幅雖短，對《詩經》之特點有深刻之闡述。

以上五種為吉川幸次郎有關《詩經》著作之較重要者。至於其具體論點，將於下節加以討論。

### 三、吉川幸次郎之《詩經》研究方法

就近代日本京都學派中國學研究之對象而言，對《詩經》之關注遠不如對三《禮》、《尚書》、《春秋》等經書之重視，<sup>18</sup>故《詩經》研究可謂非京都學派中國學者研究之主流。然就吉川幸次郎而言，其對《詩經》之研究，成

<sup>17</sup> 參見同註16，頁23-24。

<sup>18</sup> 參見拙作〈日本近代京都學派對注疏之研究〉，同註12。

果雖不若《尚書》之豐碩具體，仍可謂對《詩經》之研究投下極多心力。吉川幸次郎除有前節所述之《詩經》著作外，其在京都大學文學部所授演習課程，曾以朱熹《詩集傳》、《毛詩正義》作為講授之對象，<sup>19</sup>並曾開設「詩經學史」之研究課程。<sup>20</sup>凡此亦可見吉川氏對《詩經》之重視。

有關吉川幸次郎對《詩經》之研究方法，約可就下列幾項加以析論：

### (一)、廣搜基本資料以作為研究基礎

為進行某種研究，先廣搜相關基本資料，以作為研究基礎，此乃治學之根本方法，吉川幸次郎對《詩經》之研究，於此表現十分具體明顯。例如在〈東方文化研究所經學文學研究室《毛詩正義》校定資料解說〉中顯示，為進行對《毛詩注疏》之校定，吉川幸次郎與其同事曾廣搜有關《毛詩注疏》校勘所需之各種版本，以作為校勘之依據，這種對於文獻之重視乃承襲清代考證學之學風。京都學派中國學派創始者之一內藤湖南曾著有《支那目錄學》，<sup>21</sup>此對吉川氏當有所影響。吉川氏自己亦嘗有關於〈支那文獻學大綱〉、〈中國文獻學大綱〉之講述，<sup>22</sup>可見其於中國文獻學具有深厚之功力。由於能廣搜各種基本資料，故對於過去學者之研究成果有深刻之瞭解，對研究所需之資料亦能齊備，故其研究乃能扎實有據。

### (二)、校勘文本以確保研究之準確

吉川幸次郎所主持之「《毛詩注疏》校定」共同研究，雖未全部完成，其目的乃希望對《毛詩注疏》加以校勘，完成一部足可信賴之定本，以作為研究者之依據。東方文化研究所此種對注疏之校勘，非僅限於《毛詩注疏》，原

<sup>19</sup> 《詩集傳》為昭和三十年（1955）演習課程中所採用，《毛詩正義》為昭和三十八年（1963）演習課程所採用。參見拙作〈日本近代京都學派經學研究年表〉，同註1，頁293、297。

<sup>20</sup> 此於昭和三十二年（1958）行之，參同上註，頁295。

<sup>21</sup> 見《內藤湖南全集》第十二卷，東京：筑摩書房，1995年。

<sup>22</sup> 收入《吉川幸次郎遺稿集》第一卷，東京：筑摩書房，1995年。

先乃擬由《尚書注疏》開始，而次第及於他經。吉川幸次郎在〈校勘舊鈔本《禮記正義》——東方文化研究所第九回開所記念日講演〉中曾云：

（前略）在吾等研究室，其工作乃正從事《十三經注疏》定本之作成。目前首先著手於《尚書注疏》之校定，不日完成之後，將計畫逐次及於他經之「注疏」。此工作之內容，一言以蔽之，乃對「注疏」之校定，而其中又以「疏」之校定為其中心。現今世上所流傳十三經之疏之文本，無論何種皆極多誤字、脫字。又後人未通原著者之意，率然改動之部分亦頗有之。故吾等乃一一判斷其訛誤，俾能還其本來面目。<sup>23</sup>

由以上所言，可知吉川幸次郎等人原擬在《尚書注疏》校定完成之後，再依次及於其他各經之注疏，最後完成《十三經注疏》之校定。可惜進行《毛詩注疏》之校定至〈鄭風〉時即成絕響。在此校定諸經注疏之計畫中，最受世人矚目者乃是《尚書注疏》之校定成果。

在吉川幸次郎等人從事《尚書注疏》校定工作之前，京都學派中國學研究者中已有學者從事他經注疏之校勘，如武內義雄曾校勘皇侃之《論語義疏》，<sup>24</sup>倉石武四郎曾校勘《儀禮疏》，<sup>25</sup>常盤井賢十曾校勘宋本《禮記疏》，<sup>26</sup>此等對注疏校勘之風氣，乃成為京都學派中國學研究之傳統，吉川幸次郎等人進行《尚書注疏》、《毛詩注疏》之校定，重視文本之正確性，當是承襲此種風氣而來。

<sup>23</sup> 見《吉川幸次郎全集》第十卷，頁425。同註8。

<sup>24</sup> 此乃大正十一年（1922）武內義雄任大阪懷德堂之講師時所為。其校勘成果今收入《武內義雄全集》第一卷，東京：角川書店，1978年。

<sup>25</sup> 此乃倉石武四郎於昭和六年（1931）一月至十二年（1937）一月任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研究員時所為。其校勘成果《儀禮疏考正》於昭和五十四年（1979）由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附屬東洋文獻中心刊行。

<sup>26</sup> 此乃常盤井賢十於昭和七年（1932）五月至九年（1934）九月間，任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助手時所為。其校勘成果《宋本禮記疏校記》於昭和十二年（1937）由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刊行。

另吉川幸次郎在從事《詩經國風》之譯注時，對《詩經》及毛《傳》等亦時時加以校勘。〈鄘風·定之方中〉首章：「定之方中，作為楚宮。」<sup>27</sup>吉川幸次郎注云：

作為楚宮：流傳本作「作于楚宮」，今據數種古寫本。後「作為楚室」同。<sup>28</sup>

（案：「作為楚宮」今本所見多作「作于楚宮」，<sup>29</sup>吉川幸次郎據多種古寫本，乃改從「作為楚宮」之本。）

又〈邶風·柏舟〉：「憂心悄悄，慍于群小。」吉川幸次郎注云：

慍，毛《傳》之解原作「怨也。」今流傳本作「怒也」，誤。<sup>30</sup>

此解經文「慍」字，引毛《傳》之說並對毛《傳》流傳本之誤加以校勘也。

又如〈邶風·谷風〉：「不能我慍，反以我為讎。」吉川幸次郎注云：

不能我慍：或本作「不我能慍。」毛《傳》云：「慍，養也。」又毛《傳》一本作「慍，興也。」<sup>31</sup>

此說明經文及毛《傳》之異文。

此外，吉川幸次郎亦嘗利用敦煌本以校勘《詩經國風》，如〈王風·丘中有麻〉首章：「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吉川幸次郎注云：

<sup>27</sup> 此據吉川幸次郎譯注《詩經國風》之版本，見《全集》第三卷，頁178-179。

<sup>28</sup> 同註27，頁179。

<sup>29</sup> 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刊本《毛詩注疏》作「作于楚宮」（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本，1979年）。阮元《毛詩注疏校勘記》云：「作于楚宮：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

<sup>30</sup> 見同註27，頁110。

<sup>31</sup> 見同註27，頁141。

(前略)又：末句「將其」二字，清儒之說以為本當作「其將」，今誤倒。如同其所推測，近敦煌所發現之寫本正作「其將」。<sup>32</sup>

此引據新發現之敦煌寫本以印證清儒校勘《詩經》時之推測也。

由以上所述，吉川幸次郎之《詩經》研究，極重視文本之校勘。蓋由校勘而求得正確之文本，據此以進行研究，方能確保其材料之可靠，此亦「考證學」之一大特色。

### (三)、依據舊注以詮解《詩經》

吉川幸次郎在《全集》第三卷〈先秦篇·自跋〉中曾自述其一生中各階段對先秦經典所抱持之態度。在四十歲之前，吉川幸次郎對先秦經典本身甚少發表意見，吉川氏解釋其原因云：

一言以蔽之，乃由於我覺得此時期事情之真相，多數已沈入不可知之海底。因而我甚少對此時期發表意見，至少不直接對此發表意見。<sup>33</sup>

至於何以先秦時期之經典乃不可知，吉川氏云：

最大的不可知，乃其語言。此時期文獻之語言，包括含有極多注釋之五經、《論語》等，皆係與現代隔絕之古代語言，就連單語詞彙在字典上之涵義亦每每難以掌握。<sup>34</sup>

正因為先秦典籍中之語言難以掌握，再加上吉川氏對當時學術界以先秦研究為熱潮有一種反動之心理，<sup>35</sup>因而乃選擇以經典之注釋作為研究之對象。吉川云：

<sup>32</sup> 見同註27，頁247。

<sup>33</sup> 見《全集》第三卷，頁554。

<sup>34</sup> 同上註。

<sup>35</sup> 參見同註33，頁555。

以術語而言，與其將「經」本身作為研究之對象，不如以「經學」為對象。或者可作一比方，諸古籍，尤其是儒家之經典，乃是中國早期直覺上對人類生存之道所提出的設問，那麼後代之注釋即其答案。我想精心研讀答案而不想深入問題本身。或許此將會被批評為本末倒置，然設問之真意畢竟不可知。反之，就答案而言，為了回答設問而作之真摯思考，有時雖不免「強為之說」，其中仍帶有精細之表現。我就從事對這些答案之理解吧！（中略）因此，在那期間，較諸先秦時期之典籍，我更致力於研讀後代作為其注釋而被寫成之書籍，尤其專注於第七世紀唐人所撰成之《五經正義》。而後在同仁協助之下得以完成其中一經《尚書正義》——亦即《書經》之詳注——日譯。在我之意識中，此並非在研究五經之一的先秦典籍《尚書》，乃是對注釋者唐人之思考的研究。<sup>36</sup>

由以上吉川幸次郎所述，可瞭解其從事《尚書注疏》校定及日譯時所抱持之態度。以理推之，其從事《毛詩注疏》校正工作，亦應如是。

吉川氏於同文中又言及，此種對先秦典籍之態度，至四十歲之後稍有變化。促使此種變化者，乃因吉川氏於1947年四十四歲時由東方文化研究所轉任京都大學文學部教授，其時必須在課堂講授「中國文學史」，如此則勢必非從古代講起不可。然其時仍將先秦定位為「前文學史時代」，認為文學價值之確立乃從漢武帝時代開始，因而對於先秦時期仍寧可敬而遠之。<sup>37</sup>

五十歲以後，吉川幸次郎對先秦典籍之態度又有更大之變化，吉川氏云：

但自五十歲以後，我之態度有更大之轉變，我對此時期之文獻漸漸敢於發表意見。首先乃是對於《論語》之若干隨想，此收錄於第五卷中。<sup>38</sup>《論語》在諸古籍中，我感覺最為優美，其語言亦較易讀，因此

<sup>36</sup> 見同註33，頁556-558。

<sup>37</sup> 參見同註33，頁559。

<sup>38</sup> 原文作「次の次の巻」，次次卷即第五卷，為避免讀者迷惑，今譯作「第五卷」。

不久即完成《論語》之注釋，此收錄於《全集》下一卷中。進而，更一掃躊躇，撰成本卷所收之《詩經國風》之注釋。<sup>39</sup>

以上約略敘述吉川氏在《全集》第三卷〈先秦篇·自跋〉中所述其生平各階段對先秦古籍所抱持態度之轉變。今進一步就吉川幸次郎所譯注之《詩經國風》加以觀察，可發現其基本方法仍是透過前人之注解以解析《詩經》。吉川氏在《詩經國風》〈解說〉「四、我的注釋方法」一節中云：

以上不過略敘歷來注釋《詩經》之歷史。由於歷來《詩經》乃作為五經之一而受到尊重，其注釋書之數量，包括日本人及西洋人所作在內，應已達數百或數千種之多。然這些數百乃至數千種注釋書中，無論何種皆不能謂完全正確。此因這些詩歌乃在三千年前，處於與吾等極為相異之生活環境中且又以和現代中國語甚有距離之古代語言寫作，由此而完成之故。去其不遠之漢代，已無一定之解釋，今日則更是如此。此如同唐詩般，精思復精思，得以對詩人之意圖得有八、九成之再把握，此乃其根本之性質。其所呈現出之所有說法，皆不可避免含有假說之成分。我之注釋，當然亦僅是一種假說。然我盡力避免由我自己提出新假說，而專藉以下四種書籍以出之。此四者，其注釋方法皆各具體系，因具有體系，故使人感到安定。<sup>40</sup>

吉川幸次郎於下文所列之四種書籍乃指（一）、古注（特別指毛《傳》），<sup>41</sup>（二）、朱熹《詩集傳》，（三）、清胡承珙《毛詩後箋》，（四）、清陳奂《詩毛氏傳疏》。吉川氏謂此四種書籍以外之書則較少參考。至於當時雖漸漸有人參考民俗學之方法以研究《詩經》，吉川氏對其成果原則上並不加以利

<sup>39</sup> 見同註33，頁559-560。

<sup>40</sup> 見同註33，頁42。

<sup>41</sup> 此處吉川所謂「古注」包括毛《傳》、《毛詩序》、鄭《箋》，孔穎達《正義》等，其中尤其以毛《傳》為主。

用，因其尚未構成體系之故。<sup>42</sup>吉川氏不採用此種研究方法之成果，可從其所撰〈松本雅明《關於詩經諸篇之成立》〉一文所持之批判態度中見其端倪。<sup>43</sup>

今就吉川幸次郎譯注之《詩經國風》以考之，其多據舊注以詮解《詩經》，此方法極為明顯。茲以〈國風〉首篇〈關雎〉為例，依全書之體例，在譯注之前，吉川幸次郎先闡述〈關雎〉之詩旨云：

（此為）祈求領主幸福結婚之歌。朱子以為此蓋讚美為周王朝奠基之英雄文王姬昌及其妻太姒之歌。漢鄭玄之補注——亦即鄭《箋》——以為此乃歌詠君主之正妻為君主尋找良妾之詩，不可從。又漢之「三家詩」等派以為此乃刺文王曾孫康王姬釗之皇后之歌，今亦不考慮其說。另或以為此詩分三章者為毛《傳》之說，朱子亦從之。鄭《箋》分為五章。<sup>44</sup>

（案：吉川氏先謂此詩乃「祈求領主結婚幸福之歌」此未明言所據為何，蓋約略暗用《毛詩序》之說。<sup>45</sup>）

其下引朱熹《詩集傳》之說，並謂鄭《箋》與三家《詩》之說皆不可從。此詩之詩旨，吉川幸次郎蓋以朱子之意為依歸也。又本詩之首章：「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吉川氏注云：

○關關，鳥鳴聲之擬聲詞。毛《傳》云：「和聲也。」○雎鳩，鳥名。江村如圭《詩經名物弁解》云：「和名ミサゴ，俗名ウヲタカ。」毛《傳》舉其異名云：「王雎也。」又云：「鳥摯而有別。」謂雌雄情愛濃厚，然不於人見處交合，有禮儀之鳥。○河，黃河，或其支流。（中略）<sup>46</sup>○洲，即なかつ。毛《傳》云：「水中可居者曰洲。」又：唐之成伯璵謂鳥在河中遙遠之島，以喻后妃居於深宮之

<sup>42</sup> 見同註33，頁43。

<sup>43</sup> 此參後文所論。

<sup>44</sup> 見同註33，頁49。

<sup>45</sup> 《毛詩序》云：「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吉川幸次郎或暗用此意。

<sup>46</sup> 此處吉川氏原有註解經文「在河之洲」之「之」，今省略未引。



中。○窈窕，乃二字同韻母重疊之擬態詞，ものしずか。毛《傳》云：「幽閑也。」○淑女，淑，毛《傳》云：「善也。」女，未婚之女性，むすめ。又：淑和善同聲母，意義相近之詞，聲音亦相近。毛《傳》每每如此指明。○君子，優秀之統治者，推而廣之，即紳士。○好逑：好配偶。毛《傳》云：「逑，匹也。」<sup>47</sup>

由以上所引吉川氏對〈關雎〉首章之注釋，其中確實多據毛《傳》之說，然亦嘗引及日本江村如圭《詩經名物弁解》之文，以明其物在日本之名稱。吉川氏另又嘗引唐代成伯璵《毛詩指說》之意見。此則在吉川氏《詩經國風·解說》中所列四種書之外。此外，在〈關雎〉篇以下第二、三章之中，吉川氏亦嘗引用清朝戴震、段玉裁二人之說，並謂段氏所言「有趣」。<sup>48</sup>

綜觀吉川幸次郎注解〈關雎〉篇，其解「關關」、「雎鳩」、「河」、「之」<sup>49</sup>、「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苕」、「左右」、「流」、「之」<sup>50</sup>、「寤寐」、「思服」、「悠」、「輾轉反側」、「琴瑟」、「芼」、「鐘鼓」等21個語詞，其中引毛《傳》之說以解之者10次，引朱熹《詩集傳》者5次，引清段玉裁者2次，引晉郭璞《爾雅·注》者1次，<sup>51</sup>引唐成伯璵之說者1次，引清戴震之說者1次，引日本江村如圭之說者1次，直解其義不引述他人之說者8處。<sup>52</sup>除解詞之外，對於詩旨之解釋乃參用朱《傳》之說。由以上之現象顯示吉川幸次郎詮解〈關雎〉篇，實多據漢代至清代之舊注而較少自創新解。

吉川氏詮解《詩經》雖多依舊注，然舊注間之說未必一致，故須自其中擇一而從，或諸說並存。例如〈豳風·七月〉：「春日遲遲，采芣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毛《傳》云：「遲遲，舒緩也。芣，白蒿也，所以生

<sup>47</sup> 見同註33，頁49-50。

<sup>48</sup> 見同註33，頁51-52。

<sup>49</sup> 此「之」字為「在河之洲」之「之」。

<sup>50</sup> 此「之」字為「左右流之」之「之」。

<sup>51</sup> 見於解「芼」字下。

<sup>52</sup> 見於「河」、「之」（「在河之洲」之「之」）、「君子」、「參差」、「之」（「左右流之」之「之」）、「輾轉反側」、「琴瑟」、「鐘鼓」等詞語之註解。

蠶。祁祁，眾多也。傷悲，感事苦也。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殆，始。及，與也。豳公子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也。」鄭《箋》云：「春，女感陽氣而思男；秋，士感陰氣而思女，是其物化，所以悲也。悲則始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嫁焉。女感事苦而生此志，是謂豳風。」<sup>53</sup>孔穎達《正義》疏《箋》云：

婦人謂嫁為歸。經於「傷悲」之下即言與公子同歸，是說女之思嫁，不得為公子率民，故易《傳》，以言悲則始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得嫁焉，雖貴賤有異，感氣則同，故與公子同有歸嫁之意。雖感陽氣使然，亦是感蠶事之苦而生此志，申《傳》感二事之意也。莊元年《公羊傳》說築王姬之館云：「於群公子之舍則以卑矣。」是諸侯之女稱公子也。<sup>54</sup>

吉川幸次郎解此云：

○殆，此譯為表願望之意的助字。毛《傳》云：「始也。」○及，毛《傳》：「與也。」○公子，豳之領主之女，此從鄭《箋》，解為女公子之意。清戴震之說亦同。○同歸，歸字從鄭《箋》及戴震之解，讀為出嫁之意。同歸者，與姬君之嫁女同時期，自身亦欲行嫁也。又：此句毛《傳》解「公子」為領主之子，不解為其女，如此則指來從事農作，同時歸去，今不從《傳》說。<sup>55</sup>

此處解「殆及公子同歸」一句，乃從鄭《箋》及戴震《毛鄭詩考正》之說，以「公子」指豳君之女公子，「歸」為出嫁之意。此解不從毛《傳》而從鄭《箋》，可見其依舊注為解亦有其抉擇，非一味從古也。

<sup>53</sup> 見《毛詩注疏》卷8之1，頁12，見同註29。

<sup>54</sup> 同註53，卷8之1，頁12-13。

<sup>55</sup> 見同註33，頁438。

吉川幸次郎之《詩經國風》譯注，雖大體依舊注為解，然亦嘗引及近人之說，<sup>56</sup>然其比例不高，非吉川氏之主要依據也。

#### （四）、從分析語言以理解《詩經》

吉川幸次郎研究《尚書》、《詩經》等經典，每強調分析其語言為理解其內容之重要基礎。吉川氏在〈《尚書正義》譯者序〉一文中嘗云：

（前略）其次，作為《正義》所依據之「傳」、「注」，比起後世之注釋，不僅單單時代較早，更具有絕對之長處。此因「傳」、「注」乃作於仍以經之學問為傳統而受到尊重的時代；再者，作為其傳統之一的經之解釋必定從其語言之解釋出發；以及傳統之一的禮——即古代制度——解釋特別詳細之故。（中略）「傳」、「注」所持之傳統是否即能與作者或編者之意思一致，實有疑問。然對言語解釋之尊重，確實乃作為古典研究之態度最為出色者也。<sup>57</sup>

由以上所述，可知吉川幸次郎認為古代傳注之可貴，其原因之一乃是其解經能從語言出發，表現出對語言解釋之重視。吉川幸次郎甚至嘗謂從語言分析出發以閱讀作品之方法亦即「經學」的方法。吉川氏在〈書齋十話·六、經學〉中云：

然而，經學般之方法，在今日的世界中似仍以別種型態存在。十數年前，曾對唐代詩文稍作詳細分析，後結集題為《唐代之詩與散文》，對於此書之批評，某外國雜誌曾謂此方法與「新批評」（New Criticism）之方法酷似。此似為最近英美文學批評之方法。我很驚訝，遂購買一些此方面之書籍來閱讀。丹納（Hippolyte Taine）之文學史研究

<sup>56</sup> 如解〈周南·桃夭〉之詩旨，引陳子展之說，見同註33，頁62。

<sup>57</sup> 見《全集》第八卷，頁6，東京：筑摩書房，1998年。

方法乃重視作品產生之環境，此則與之相反，乃是從作品之語言分析出發的方法，亦即確實為「經學」之方法。<sup>58</sup>

由於吉川幸次郎有此觀點，故其研究《詩經》亦即採用透過語言分析以探究《詩經》內容之方法。在《詩經國風》〈解說·四、我的注釋方法〉中吉川氏自言其所譯注多採用「古注」、朱熹《詩集傳》、胡承珙《毛詩後箋》、陳奐《詩毛氏傳疏》等四種著作。且謂：

以上四種書籍之外，則較少參照。最近亦有一些參酌民俗學方法所作之研究成果出現，然原則上不加以利用。因為感覺其尚未成體系之故也。至少，對於古代語言，感覺能達到像胡承珙、陳奐此種程度之學者，其後似尚未出現。<sup>59</sup>

正因古注、朱《傳》、胡承珙、陳奐等著作中對於古代語言之理解較為正確可靠，故吉川幸次郎譯注《詩經國風》乃多據以為釋也。例如〈鄭風·丰〉第三章：「衣錦褰衣，裳錦褰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毛《傳》云：「衣錦褰裳<sup>60</sup>，嫁者之服。」孔穎達《正義》疏《傳》云：

知者，以此詩是婦人追悔，願得從男，陳行嫁之事，云已有此服，故知是嫁者之服也。而婦<sup>61</sup>人之服不殊裳，而經衣、裳異文者，以其衣、裳別名，詩須韻句，故別言之耳。其實婦人之服，衣、裳連，俱用錦，皆有褰，下章倒其文，故《傳》衣錦、褰裳互言之。<sup>62</sup>

又陳奐《詩毛氏傳疏》云：

<sup>58</sup> 見《全集》第二十卷，頁14-15，東京：筑摩書房，1999年。

<sup>59</sup> 見同註33，頁43。

<sup>60</sup> 「裳」字阮刻本原缺，據阮元《毛詩注疏校勘記》補。

<sup>61</sup> 「婦」字阮刻本原缺，據阮元《校勘記》補。

<sup>62</sup> 見《毛詩注疏》卷4之4，頁2，同註29。

《正義》云：「婦人之服不殊裳，而經衣、裳異文者，以其衣、裳別名，詩須韻句，故別言之耳。其實婦人之服，衣、裳連，俱用錦，皆有絮，下章例<sup>63</sup>其文，故《傳》衣錦、絮裳互言之。」

（案：孔說是也。《傳》「衣錦絮裳」乃總括詩辭，如《說文》：「東方昌矣」、「犬夷咽矣」、「風雨濛濛」并二句爲一句，其例正同。<sup>64</sup>）

吉川幸次郎解此詩云：

毛《傳》將此與結婚典禮相聯繫，謂：「衣錦絮裳，嫁者之服。」又：婦人之服乃上衣與裳相連的「ワンピース」，此處分別言之者，陳奐引唐人《正義》之說，以為乃語言修辭之故。<sup>65</sup>

（案：孔穎達《正義》、清陳奐《詩毛氏傳疏》等以語言修辭之角度解經、《傳》之文，頗具見地，吉川幸次郎此處乃引述其說，亦可見其能善用前人之見解也。）

由於吉川幸次郎研究《詩經》等經典，重視語言之分析以及語言自身所具之美感等內涵，故對於同時代學者之研究方式乃持反動或批判之態度。在《全集》第三卷〈先秦篇·自跋〉中嘗云：

在彼處，對同時代多數者的反動，也曾以如下的方式呈現。最近之學者，研讀此時期之文獻，大抵將其視為古代史，尤其是社會史之資料加以利用。原來為提供真實與美感之規範而存在之「經」，此等學者乃據之以運用於其他目的。例如「禮」之「經」，記載著作為人類善意表現之種種儀式之程序，現今卻幾乎僅被當成古代民俗之研究資料來閱讀。甚至連《詩經》亦然。此就歷史學之目的而言，應是可慶賀之事。然此與拿平安時代閨秀所作之詩歌去考察彼時之經濟生活之學

<sup>63</sup> 此「例」依《正義》原文校之，當是「倒」之誤。

<sup>64</sup> 見陳奐《詩毛氏傳疏》卷7，頁26，北京：北京市中國書店影印漱芳齋藏版，1984年。

<sup>65</sup> 見同註33，頁279。

問豈非類似？皆非依照書籍原來所要求之方向來解讀。或又：我亦觀察到，將古代書籍僅以古代史之資料來閱讀，將會產生積極性之弊害。歷史學家所追求者，乃是古代書籍之語言所傳達之事實。只要能取得事實，言語即被捨棄，可謂「得魚忘筌」。作為歷史學，此或許並無不妥，然依其目的，則語言本身所具備之美感（此時期之書籍已具備極豐富之語言美感），乃被漠視，漠視到令人氣結之程度。或又：歷史學家往往將文獻語言往相信可達到之事實體系之方向整合，這豈非產生另一種「強為之說」乎？（中略）由於熱衷追求事實，以致對語言內在的韻律以及其反映於外的聲音之韻律會產生遲鈍感，這乃必然之弱點亦未可知。然而，向來中國人之注釋，對於古典籍中語言之韻律十分敏感。甚或令人覺得那才是其主力所在。我可謂少數對此較為熟知者之一，現今或乃絕無僅有者。既然如此，宜擬對本世紀學者之偏頗嘗試作些規正。我之《論語》注及《詩經》注，即基於上述之態度所撰寫。我個人感覺，基於上述態度所表現出之能力，《論語》注之成果較佳，《詩經》注略遜一籌。然而無論二者中之何種，我皆以選擇介紹前人之說為工作之重心，對於建立自己之新說則儘量節制。在我容易流於保守之工作中，又係更為保守。<sup>66</sup>

由以上吉川幸次郎之描述，對於其《詩經》研究中重視原文語言之態度可以有更清楚之瞭解。吉川幸次郎對於同時代歷史學者僅熱衷於自古典籍中追求事實而忽視古籍語言中所具之美感感到不能認同。其《論語》注及《詩經》注即是對這種潮流之一種反動。

<sup>66</sup> 見同註33，頁560-562。

#### 四、吉川幸次郎《詩經》研究方法之檢討

吉川幸次郎治學之層面極廣，經學雖非吉川幸次郎學問之重心，卻是其學問之重要基礎。吉川幸次郎甚至將由經學中所習得之方法運用於文學研究上。在《全集》第八卷〈唐篇 I · 自跋〉中，吉川氏曾自述云：

（前略）又〈譯者序〉第十三頁中，對此書<sup>67</sup>可能給予眾人的效用之一，嘗云：「中國文學之研究者，可藉由此書明瞭中國人之敘述方式。」對我自身而言，大約曾得到如此之效用。我熟讀此書直至能翻譯之程度，從中學得孔穎達對於《書經》本文及孔氏《傳》之語言不厭其煩所施予之分析、演繹、考證等方法，且嘗將此等方法移之運用於文學書上。施行之始，避開中國文學之核心作品，首先施用於二流文學，即《全集》第十四卷〈元曲金錢紀〉、《全集》第十五卷〈元曲酷寒亭〉等是也。帶著躊躇，開始接近較為中心之文學以施行之者，乃《全集》第十一卷所收之〈韓愈文〉、〈王昌齡詩〉、〈新唐詩選〉及其續篇是也。進而，乃現在仍持續所撰寫有關杜甫之諸書是也。對於作為文學批評家乃至文學解釋家我的之方法而言，嘗給予我最多恩惠者，正是此書也。<sup>68</sup>

由以上所述，可以得知吉川氏之經學研究經驗，對於日後之文學研究，實有很大之助益。<sup>69</sup>

吉川幸次郎對《詩經》之研究成果不若對《尚書》研究般受人矚目。原因之一乃因吉川氏對《尚書注疏》之校定與日譯具有開創性，且其計畫順利完成，成果具體。而其《毛詩注疏》之校定與日譯則因故停頓，未竟其功。此外，吉川氏對於《詩經》之譯注亦僅止於〈國風〉，未能擴及全書，亦頗有遺憾。以下擬就吉川幸次郎《詩經》研究方法之優、缺點略作論述：

<sup>67</sup> 此指孔穎達之《尚書正義》。

<sup>68</sup> 見同註57，頁505-506。

<sup>69</sup> 類似之說亦見於小川環樹〈由經學至文學之路程〉一文，收入桑原武夫、富士正晴、興膳宏等合編《吉川幸次郎》，同註3。

### (一)、吉川幸次郎《詩經》研究方法之優點

吉川幸次郎研究《詩經》，所採取之方法如廣搜基本研究資料、校勘文本、運用前人注釋、分析語言等，綜合觀之，即是「考證學」之方法。<sup>70</sup>吉川幸次郎大量閱讀清人之著作，在治學方法上頗受其影響，在〈書齋十話·六、經學〉中，吉川氏認為中國經學史第一高峰為後漢末，第二高峰為唐代，第三高峰為清代。對於清代，吉川氏云：

我對此時代之書籍，自認為已曾大量閱讀，如今回顧，則不過僅閱讀其中之一小部分而已。只達到能判別何種著作為優秀，何種著作非是之程度。對我助益最多者為段玉裁（1735-1815），尤其是其所撰之《古文尚書撰異》。<sup>71</sup>

吉川幸次郎心儀於段玉裁之學問，其治《尚書》、《詩經》等書，自然會受到清代考證學風之影響。此外，狩野直喜對吉川幸次郎之影響亦不可忽視。<sup>72</sup>

吉川幸次郎以實證之方法研究《詩經》，使其研究不會流於空疏或悖離解讀古籍之基本法則。舉例而言，〈周南·關雎〉：「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sup>73</sup>現代學者或有因詩中有「鐘鼓樂之」之句，遂解此章為形容君子與淑女正舉行婚禮時之狀況。<sup>74</sup>然吉川幸次郎譯注《詩經國風》，解此云：

<sup>70</sup> 參看近藤光男《清朝考證學研究》，東京：研文社，1987年；木下鉄矢《「清朝考證學」及其時代》（東京：創文社，1996年）；漆永祥《乾嘉考據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等書。

<sup>71</sup> 見同註58，頁140。

<sup>72</sup> 狩野直喜曾自言：「吾所為乃考證學也。」（見小島祐馬〈通儒狩野先生〉中所引，文刊《東光》第五號「狩野直喜先生永逝記念」專刊，1948年4月，京都：弘文堂書房出版。）另參考吉川幸次郎〈先師與中國文學〉一文（原刊《東光》第五號，收入《吉川幸次郎全集》第十七卷）。

<sup>73</sup> 見《毛詩注疏》卷1之1，頁23-24，同註29。

<sup>74</sup> 如高葆光《詩經新評價》中解〈關雎〉詩云：「一對青年男女，正在舉行婚禮，旁觀羨然的人，一邊道賀，一邊調笑。」（頁29，臺中：中央書局，1969年）。



○此章讚美被求得之淑女，於結婚之後為夫之良友，演奏樂器，建立和樂之家庭。然鄭《箋》之解釋有異，且將此章中分為二章，今不從。（中略）○鐘鼓：鐘與太鼓，與琴瑟皆為貴族家庭中所演奏之音樂。<sup>75</sup>

吉川氏此處解此章之義，不從《箋》說，亦不若現代部分學者之解為正在結婚時之盛況。吉川氏所解雖未明所據，今考朱熹《詩集傳》於「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章下云：「此章本其未得而言。」<sup>76</sup>又於末章下注云：

此章據今始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既得之，則當采擇而烹芼之矣；此窈窕之淑女，既得之，則當親愛娛樂之矣。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幸而得之，則有以配君子而成內治，故其喜樂尊奉之意不能自己又如此云。<sup>77</sup>

案：吉川氏解「左右芼之」之「芼」，從毛《傳》之說，而不從朱《傳》，<sup>78</sup>然其以詩之末章乃形容結婚後之情況，此或嘗參考朱《傳》而未明言。然究其要，蓋依古代文獻所顯示，古人婚禮不用樂，<sup>79</sup>「鐘鼓樂之」依古禮實不宜解為婚禮進行時之情況，吉川幸次郎此處所解，可反映出其乃熟諳中國古代禮儀文獻者，故所解乃能不偏離古義也。

<sup>75</sup> 見同註33，頁52。

<sup>76</sup> 見朱熹《詩集傳》卷1，頁1，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年。

<sup>77</sup> 同上註，卷1，頁1。

<sup>78</sup> 吉川幸次郎解云：「芼，毛《傳》云：『擇也。』」（同註33，頁52）又云：「晉郭璞解作『拔取也。』朱子解作『熟而薦之也。』暫不從此等之解。」（同上）。

<sup>79</sup> 如《儀禮·士昏禮》中未見用樂之文。又《禮記·曾子問》云：「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禮記注疏》卷18，頁16，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刊本，1979年）又《禮記·郊特牲》：「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同上，卷26，頁20）皆顯示古人婚禮不用樂也。

吉川幸次郎注解《詩經》多依舊注而擇從之，其自言此種方法乃「保守」之作法，然對舊注充分瞭解，擇其適當者而從之，此種方法使得吉川氏所解具有其客觀性，且平實有據。吉川幸次郎曾批評松本雅明所著之《關於詩經諸篇成立之研究》一書雖多新見，然而有如下之缺點：

又：著者急於破除毛、鄭以來的舊說之餘，對於此等舊說之理解有不夠充分之處，此在前文亦嘗論及，當是此書之缺點。（中略）再者，急於破除舊說之餘，有儘量使自己之解釋遠離舊說之傾向。例如確立「興」之修辭乃氣氛象徵，此為著者功績之一，然如著者此種方向之解釋，在舊說中是否完全未見，實不無疑問。<sup>80</sup>

吉川幸次郎批評松本雅明之缺點，正是吉川氏自身所努力避免者。尊重舊注，不務新說，正是吉川氏詮解《詩經》之優點。

至於廣搜基本研究資料，使研究所資更為充分；校勘文本，使研究資料更為可靠；其優點固不待多言。又：從分析語言進而瞭解《詩經》之內容，探求《詩經》中之史實而不忽視語言本身之美感，此亦有助於準確、充分理解《詩經》之本質。

## （二）、吉川幸次郎《詩經》研究方法之缺失

吉川幸次郎之《詩經》研究方法固然有其優點，然亦有其缺失。首先，吉川幸次郎譯注《詩經國風》，多依舊注，而少發創見，此雖可使其所解客觀有據，然有時不免流於過度保守。例如吉川氏譯注《詩經國風》，在每一〈國風〉之前皆有解題，以敘述各〈風〉之地域、時代、國君世次等，其論述多據《毛詩序》及鄭玄《詩譜·序》之說，故亦採用《毛詩》「風雅正變」之體系。在卷一有關二〈南〉之解題云：

<sup>80</sup> 見《全集》第三卷，頁483-484，同註33。

〈周南〉、〈召南〉之字義雖未如斯分明，然此二卷所收之詩，皆周王朝創業期之詩歌，此宜可首肯。因為此等詩歌皆有明朗之氣氛，當是作於充滿人類希望之時代。至少此和〈邶風〉以下之各卷，充滿悲哀與憤怒有異。古注區別兩者，將此二卷稱為「正風」，將其後各卷稱為「變風」。所謂「正風」，乃擁有人類平正秩序之時代所作之詩歌。<sup>81</sup>

吉川幸次郎於二十世紀之時譯注《詩經》，因依據舊注之故，乃仍舊信從《毛詩》家說《詩》所採用之「風雅正變」體系，則不免過度保守。又如〈邶風·終風〉首章：「終風且暴，顧我則笑。」毛《傳》云：「終日風為終風。」<sup>82</sup>吉川幸次郎解云：

終風，毛《傳》云：「終日風為終風。」今據之。然清王念孫倡異說，如前〈燕燕〉篇「終溫且惠」條所言，「終……且……」之義同「既……且……」，則此處讀為「既有風而又暴虐」。<sup>83</sup>

案：王引之《經義述聞》卷五「終風且暴」條引王念孫之說，以為「終風且暴」當讀為「既風且暴」。<sup>84</sup>其舉證充足，當可據信，後代詮解《詩經》之學者亦多從之。吉川幸次郎解此句，仍以毛《傳》為據，而以王念孫說為附帶之別說，此亦未免過度從古。另如解〈邶風·凱風〉之詩旨，仍從《毛詩序》「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之說，<sup>85</sup>所解亦過於保守。

其次，吉川幸次郎譯注《詩經國風》鮮少採用現代學者之研究成果，未能反映解經者所處之時代精神。例如〈邶風·新臺〉：「魚網之設，鴻則離

<sup>81</sup> 見同註33，頁48。

<sup>82</sup> 見《毛詩注疏》卷2之1，頁15。同註29。

<sup>83</sup> 見同註33，頁122。

<sup>84</sup> 見王引之《經義述聞》卷五，頁6，臺北：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1977年。

<sup>85</sup> 見《毛詩注疏》卷2之2，頁15-16，同註29。

之。」毛《傳》云：「言所得非所求也。」鄭《箋》云：「設魚網者，宜得魚。鴻乃鳥也，反離焉，猶齊女以禮來求世子，而得宣公。」<sup>86</sup>吉川幸次郎釋「鴻」字云：

鴻：朱子：「雁之大者。」<sup>87</sup>

吉川氏解「鴻」字，依朱子之說，故將「鴻」字訓讀為「おとり」。有關〈新臺〉「鴻」字，聞一多曾撰有〈詩新臺「鴻」字說〉一文，以為「鴻」乃「苦蠶」之合音，即是蟾蜍。<sup>88</sup>此說頗具新意，其文發表在吉川幸次郎譯注《詩經國風》之前，<sup>89</sup>然吉川氏未能參用，殊為可惜。

再者，吉川幸次郎譯注《詩經國風》雖多據舊注，卻未論述有關「興」之相關問題，此或出自於對當時學者熱烈論「興」之一種反動，<sup>90</sup>然研究《詩經》而不及「興」，似亦有所未足。

## 結論

吉川幸次郎之《詩經》研究，相較於《尚書》研究，過去較少受到學者為文討論，本文以吉川氏所著《毛詩注疏》校定成果、〈東方文化研究所經學研究室《毛詩正義》校定資料解說〉、《詩經國風》譯注、〈松本雅明氏《關於詩經諸篇之成立》〉、〈詩經與楚辭〉等資料為主，探討其《詩經》研究之方法。經由本文之分析，可知吉川幸次郎研究《詩經》，以廣搜參考資料、校勘文本、依循舊注、分析語言等為其重要方法，此種方法乃沿襲清代之考證學風，並嘗受其師狩野直喜之影響。吉川幸次郎之《詩經》研究方法，使其所論

<sup>86</sup> 見《毛詩注疏》卷2之3，頁1，同註29。

<sup>87</sup> 見同註33，頁163。

<sup>88</sup> 文刊《清華學報》10卷3期，1935年7月。後收入《聞一多全集·古典新義》，上海：開明書店，1948年。

<sup>89</sup> 聞一多此文發表於1935年，吉川幸次郎所譯注《詩經國風》則於1958年出版。

<sup>90</sup> 當時學者如松本雅明《關於詩經諸篇之成立》、白川靜〈興的發想之起源及其展開〉（《立命館文學》187、188期，1961年1月、2月）等皆熱衷於探討《詩經》中「興」之相關問題。

客觀有據，並能重視《詩經》語言中所具之美感。然其解詩多依循舊注而少創新，又鮮少利用清代以後中、日學者之研究成果，故所解未免流於過度保守，其仍採用《毛詩》「風雅正變」之說以解說各〈國風〉之時代，尤為顯著之例也。